

1935 年 嘉陵江“一·九兵变”

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于 1935 年 1 月 9 日,在嘉陵江国民党川军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中策动了一次兵变,即“一·九兵变”。

早在 1934 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创立之际,中央四川省委就已在国民党川军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驻防今郫县、彭县一带)发展党组织,以牵制四川军阀进攻川陕根据地的力量。较早被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以结拜“盟兄弟”的方式,联络广大中、下层官兵,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培养革命思想。由此,共产党组织在混成旅中逐渐发展了起来。

1935 年夏,地下党组织得知第六混成旅要从川西赴川北前线,围截红军。他们随即报告省军委。省军委立即派阮自强、熊子禅、王云武 3 同志来第六混成旅,并成立了川军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地下党支部。不久,第六混成旅中的共产党员已达到 400 余人。党支部明确指出,党在第六混成旅的中心任务就是利用部队换防,开赴川北的机会发动广大官兵,进行兵变。

1935 年 1 月,地下党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但他们依然抓紧做准备工作,武装兵变开始进入了实施阶段。为了壮大暴动队伍,党支部在二团二营的六连和八连中广泛发动士兵,形成了一支有 400 多名士兵的强大力量。而且,他们还按照政治态度将发动起来的“盟兄弟”分为赤色群众和灰色群众。依靠赤色群众,团结灰色群众,为后来发动兵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 月初,第六混成旅进入剑阁嘉陵江江防前线,与川陕根据地隔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江相望。考虑到二营驻地附近有一个渡口立沟河,地理环境好,群众基础好,党支部决定在六连轮驻立沟河时发动兵变。

1934年 员月 怨日,六连将调离立沟河驻地。在无法得到根据地党的指示和红军配合的情况下,党支部决定于 员月 愿日夜 员时发动兵变。并计划了兵变的步骤,首先进行肃反,对反动骨干分子坚决镇压,把对兵变有危险的那部分人借故调走。而后立即进行兵变,依靠赤色群众,团结灰色群众,发动思想保守者。具体军事部署是:第一个被培养为党员的李奇柱带领一排攻打五连,党支部组织委员吴建初指挥二排警戒江口方向的三营,党员李钰炽带领三排协同八连攻打营部,挟制七连,党支部宣传委员阮自强控制渡口,负责全线联络。攻下营部后再进攻团部,万一情况不利,便趁机渡江投奔根据地。

员月 愿日夜,由于担心走漏消息,六连提前行动,反动分子排长潘大璋、罗征明等首先被处死。李奇柱带一排迅速攻打五连。在一番激战后,五连驻地被攻下。此时,李钰炽带领三排攻打营部,但因势单力薄,与敌军相持不下,营长彭友朋趁乱逃跑。很快,两支队伍的行动被报告到第六混成旅二团团部。团长汪良立马调集一、三两个营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营驻地逼进,此时天已将明,情况十分危急。党支部决定率起义部队分三批渡江。最后,共有 缘人顺利渡江,到达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这就是“一·九兵变”的全过程,虽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在国民党内部策动兵变,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实践成功,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圆猿遵义会议召开

遵义这一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贵州省北部黔北高原上,是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四省的交通连结点,地形十分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并且是黔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度过了决定其自身与中国革命命运的猿天——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领导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命令红军硬打硬攻,使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损失过半。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在通道、黎平召开了会议,两会上都采纳了毛泽东转战贵州的正确主张。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打过乌江去,并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后,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并于1月27日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红军进入黔北后,敌人继续调集重兵,部署新的围攻,红军的处境仍十分危险。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受到的重大损失,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疑虑和不满。与前四次军事“反围剿”胜利比较,他们迫切要求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路线。同时,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也开始觉悟,转变立场,同意召开会议重新确立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这就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大背景。

党中央负责人进入遵义城后,周恩来等积极筹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急待解决的重大军事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下,做了各项具体筹备工作。包括拟定开会日期、参加会议人员,并通知博古(秦邦宪)准备在会上做报告,而且还议定了会议的议程。遵义会议的前奏在紧锣密鼓中开始了。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最终在遵义老城市尹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住处举行。据史料记载考证,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以及红军总部、各军团的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充当翻译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由此可见,会议旨在集中全力围绕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要作出决定。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博古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而非主观,为自己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随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对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应负一定的直接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而且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支持毛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中来工作。

接下来,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做了发言,即《毛张王提纲》。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由毛、张、王三位同志向会议提出的提纲,被会议通过,形成了“原则决议”。但历史资料并没有关于《毛张王提纲》形成时间的记载,至今还未能发现原文。综合多方面历史资料、文献,得出该文主要从理论及实际上分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评了战争中军事领

导错误的指导方针及作战策略,并分析了红军战胜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应采取的作战方针。所以说该提纲给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定了基调,为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确立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和统一全党的军事指导思想起到了理论上的准备作用。

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另外,其他同志在会上有半数作了发言,批评了博古的总结报告,用客观存在的具体事实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及红军的特点进行科学分析,一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中受挫,主要原因是主观上博、李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他们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护毛出来领导工作。

由此,在会上通过对张闻天、博古两个报告内容的讨论,对军事领导上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的领导错误的是(李德)、博、周三同志;而(博、周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据《遵义会议文献》记载:“扩大会议最后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李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朱继续指挥。另外,据查实,王稼祥同志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这是中共打破国际高度集中制的领导体制，撤销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职务和决定自己党的中央负责人的第一次独立自主的组织行动。

参加会议的同志根据新的形势，在刘伯承与聂荣臻的提议下，对今后的红军行动指明了方向，“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2月26日闭幕。“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会上得到多数与会者认同与拥护的《毛张王提纲》是以毛泽东所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这使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赞同，从而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制定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及其正确军事思想的领导，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央和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1933年第一次察东事件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友善外交”的掩盖下开始向华北发动了新的进攻,为了实现其吞并整个华北的阴谋,日寇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第一次察东事件便是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侵略行为的一个开端。

1933年1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1933年1月15日撤退而未履行,所以司令部决定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高桥坦向第10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采取“断然态度”。

显而易见,以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是他们妄图策动“华北自治”阴谋的第一步。面对日帝的威逼与陷阱,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日方武力要挟下,南京国民党政府惟恐事态扩大,电令何应钦作为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解决,即由宋哲元解决,以求“大事化小,大事化无”。19日,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立即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以求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然而,这次国民党过份高估了“友善诚意”,侵略成性的本质使国民党“息事宁人”的如意算盘落空。1月20日,日军组织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1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21日,日军又以大炮、飞机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向独石口以东长城附近的东栅子进行轰炸。接下来的两天,日军继续轰炸当地的村庄,毁坏民房,炸死群众 源 余人。并于 圆 日,进占东栅子。

这就是日军在华北制造的第一次察东事件,日帝妄图以此削弱中国政府对长城以东地区控制的目的,进而一步一步达到其吞并整个华北的阴谋。

源瑶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初,蒋介石纠集各路军阀,拼凑了10多个团,约2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进逼,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猿省交界地区。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分析了敌我形势,纵观全局,决定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时,派红一方面军先占领赤水,然后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建立西北根据地,以粉碎国民党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的计划,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1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开始北上。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红五、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路,红三军团为左路,分头向赤水方向前进。为了配合这次北渡,中央军委电令中央红军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及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令其以主力向西线进攻,红二、红六军团积极活动,造成入川威胁长江交通的形势,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

29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突破黔军侯之担部约猿个团的拦阻,攻占了土城,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五、红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30日,红五军团一部在梅溪击退川敌4个团,左路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当红军左路和中路纵队在赤水河畔的土城集中时,红三军团在团长彭德怀率领下和红五军团一部分在青冈坡与川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军首先向敌人发起进攻,与敌人进行拼杀,但敌人后继部队源源不断,红军始终冲不出敌人控制的一个葫芦形隘口。原来红军破译敌人电报时,误将猿个旅译成了猿个团,造成兵力上的悬殊。正在关键时刻,朱德总司令飞速调来干部团、五军团主力,一起投入战斗,才把敌军压过几个山头,给敌人重大杀伤。随即胜利渡过了赤水,挺进到离长江仅几十里的四川叙永,准备渡江。

愿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改由赤水北上渡江为四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愿日猿时,西渡赤水河开始。赤水河是黔北的三大水系之一,河道曲折,土城一般河面宽约愿米,因此西渡赤水河,能否架好浮桥是一大关键,周恩来亲自带领人员于愿日凌晨在土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当天,红军各军团先后渡过赤水河西进。

一渡赤水后,愿日红军到达扎西地区,在扎西休整期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愿日,中央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河,再次向黔北进军,以摆脱川军、滇军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愿日,中央红军各纵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地区。愿日至愿,中央红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河)。接着,以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员个团向赤水开进,以吸引和迷惑追敌。愿日,红一军团第一团突然进攻桐梓县城,黔军弃城而逃,援军退守娄山关。愿日,中央红军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

地区滞留湘军，集中主力南取娄山关。当时，娄山关由黔军杜肇华旅和第十五军团防守。当日拂晓，我军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人为了夺回已失之地，增加兵力，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圆日晨，红军又占领了遵义城。至此，中央红军在短短的五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圆个师又愿个团，毙伤敌圆四余人，俘敌猿四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于猿月圆日飞抵四川重庆，在那里制定了围攻红军的新计划。为了加强作战指挥，粉碎敌军围攻，中革军委于猿月源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缘日，又决定以红九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及军团干部等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个胜仗。接着，红军突击周浑元纵队和其军一部的斗争均未达到目的。至此，红军在遵义西南地区活动将近一周，又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于是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寻找红军作战。根据敌情的变化，猿日，中央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并在转移中歼敌，但在转移作战中一再处于被动地位。

猿月缘日，中央红军为了避免被动，再寻战机，于黄昏主动放弃进攻鲁班场，转兵西进。猿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蒋介石听到红军又渡赤水河西进，认为红军的战斗仍未稍减，不可轻视，但他又自慰地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给养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找到，这一地区又是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峭险峻，大部队无法行动，看来红军今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后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了。于是他重操“碉堡战术”,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百战百灵的“可靠法宝”。他令薛岳率部尾追侧击红军时,采取在江西修碉围攻的办法,又令李韞珩都在遵义周围修碉这样,蒋介石布下的乌龟壳——碉堡,从乌江南岸各渡口,乌江北岸的大定、黔血、金沙、仁怀、遵义、桐梓沿线都已初步形成碉堡线。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并以为胜券已经在握,只待红军进入碉堡了,并宣称,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可他却未料到,毛泽东却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回师东渡,夺取战略主动权。据此,在 1935 年 1 月 3 日三渡赤水之后,中央军委于 1 月 4 日发布四渡赤水的命令。中央红军突然东渡,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无法招架。他判断红军又要进攻遵义,于是调兵遣将,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1 月 5 日,中央红军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区。次日,红九军团吸引敌人北向,以掩护主力南进。6 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7 日,分路由江口、大塘等处南渡乌江,歼敌圆个营,进驻息烽西北地区。至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一渡赤水,受阻后挥戈东向,二渡赤水。因黔北建立根据地受阻,鲁班场战斗失利,又挥戈东向,三渡赤水。这只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渡水之后一有机会,立即又挥戈东向,四渡赤水,然后绕个大圈,跳出了包围圈。四次渡水,搞得敌人东奔西突,“不亦乐乎”,为取得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及抗日战斗奠定了基础。

缘年广田发表演说

长久以来，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是在侵华的具体策略上，日本军界和政界却各持己见。军方特别是少壮派军人十分迷信武力，认为依靠武力是征服中国的捷径，而政界则企图依靠武力，辅之以政治讹诈，外交手段以实现“大日本帝国”的梦想。但两者目的都相同，殊途同归，配合十分默契，像绝妙的双簧。

缘年 缘月，日军在察东制造事端，轰隆隆的炮声在中国的华北响起。正在这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却起劲地唱起了中日“友善”、“提携”的高调。缘月 缘日，在日本议会上，广田在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和蔼可亲的和平天使，极力主张和平睦邻主义。在演说开头，他便说：“帝国政府极重视东亚诸国之和亲，故期望此等诸国，共同担负东亚和平及秩序维持之重责。”就中国问题，他具体谈到：“因此，帝国政府策望中国能从速早日安定，并对于东亚之大局能予以觉醒，以使帝国真挚之期待之吻合。”

当时，日本军方一再要求扩军，加强战备，所以对广田这一所谓的“不威胁、不侵略原则”立即表示反对。但广田却反驳道：“虽然日本的前景不甚乐观，但我保证在我执政期间不会发动战争。”然而，我们现在却对这一保证嗤之以鼻，因为事实证明他的话只是信口雌黄。

显而易见，在广田的措词饱含着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对东亚大局能予以觉醒”，不就是要中国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吗,日本要做东亚霸主,各国必须躬而敬之。而“希望中国方面对此予以格外之协力”则是指要中国服服贴贴做日本的殖民地附属国。

当时,在国内就有人指出“究竟中日亲善能亲到怎样一种程度,……但一定不是中国之福,可以断定的”。更有人是一针见血:“所谓两国的亲善,实际上是什么意味,还不是灭亡中国的别名吗?”由此可见,中国的广大民众非但未被“亲善”、“提携”的华丽词藻所迷惑,而且早就看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虚伪的“亲善”外交,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作为亲日派头子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历来是主张“中日关系,无论如何应该亲善”的,所以他对广田演说的反应的热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圆月份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汪就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对日关系书”,大谈中日提携的必要和应促其实现,他说:“广田的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大致吻合,……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

而作为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对广田演说又作何反应呢?受英美和本阶级利益驱使,蒋集团是不甘心充当日本的傀儡,任其摆布的。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就决定它有很大的妥协性,而当时英美考虑到本国利益,对日本态度有了软化,所以,原来作为亲英美的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广田演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所以,南京蒋汪合作政权对日态度达到了一致,认为广田演说高度评价了多年来中国关于对中日关系所作的努力,并决心继续努力于日中关系的调整。

紧接着,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会见了日本驻华的公使馆公使有吉明、武官铃木美通等,进行了一系列为了“中日正常化”的重要会谈。在与铃木的会谈中,蒋对铃木说:“无论如何,中日两国

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当极力取缔，但完全消灭，尚须相当之时日”。而正在此时，国民党政府发表了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该文系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录，并以法律学者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文章宣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并建议国民党政府不要拖延，不要僵持，不必拘泥，应以诚意去和日本解决悬案。文章发表后，各报纸竞相转载。该文章充分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它的发表反映出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惑下，开始出现了妥协和动摇。

广田演说的发表是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日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的出台，表现了日本在独霸中国既定国策的前提下，采取了政治、军事手段兼用，以武力威逼与外交诱惑相结合，企图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就范的策略。而国民党政府对这一演说热情呼应则表明了蒋汪政权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它的阶级本质及由其决定的妥协性和软弱性的一面，都注定了它不能给中国人民真正的解放，反而将中国人民的自主、自由抛之于脑后。

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建立

1936年10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珠河县南部三股游击队建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由赵尚志担任大队长,李福林任政治指导员,李启东任经济部长。游击队宣告:“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游击队建立以后,转战南北,取得了很多胜利。1936年11月,珠河游击队在道北半截河召集“爱民”“北来”等1000余支抗日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组成哈东“反日联合军司令部”,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36年12月10日,根据珠河县委与满洲省委的决定,又成立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将所有要求入队的义勇军、编入哈东支队,由赵尚志任支队司令。重整后的部队力量大大加强,在道南、道北和宾县广泛开展活动,反抗日本在东北的统治。1936年秋,哈东支队因受中央五中全会“左”倾关门主义的误导,发生了哈东支队第三总队误缴山林队于兀江队委任的“后方游击队”枪支的事件,引起了刚刚加入的“黄炮”“铁军”等队的叛乱。

1936年12月10日,在满洲省委派遣的冯仲云的主持之下,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并成立了第三军司令部,将部队编为第一师。赵尚志任军长兼师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日伪军又调集大批兵力开始进攻第三军,赵尚

志领导的第三军为粉碎敌军的进攻，一部自珠河南部根据地后经双城、阿城、宾县、延寿县境，直趋方正，横扫沿途敌军；该军另一部则在亮河与伪军孙团激战，击毙了伪军参谋长；又一部在延寿中和镇附近与敌伪军大战，敌人死伤数十名，并用战马拖尸败北。第三军威震哈东县。

1933年 圆月，勃利县连珠岗首先爆发了反抗日伪暴政的斗争，并成立了“东北反日民众军”，谢文东为司令，景振卿为前敌总指挥。1933年 猿月，第三军司令部在方正境内，与依兰土龙山暴动的民众军谢文东残部、吉林自卫军余部李华堂支队、驼腰子金矿工人起义组成的“明山队”会合，共同协商之后，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

1933年 夏，《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进攻，对哈东县更是实行毁灭性的“讨伐”，到处烧杀掠夺，路南游击区在敌人的“扫荡”下几乎成为一片焦土。在这种形势下，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活动变得非常困难，为避免敌人进攻对第三军造成的损失，1933年 8月 14日，中共珠河中心县的县执委会决定，第三军主力部队再次东征。主力部队东征以后，由留守部队负责保卫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东征的第三军主力，不久与第四军会合，开辟了方正、依兰、勃利边境新的游击区。

1933年 11月，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又在勃利九龙沟决定，军部率三军一部北征，帮助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又联合李延禄、谢文东、李华堂和汤原游击队建立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使之成为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统一军事领导机关。就这样，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不屈不挠地成长壮大起来。